

光明文化周末

13、14版

签名本搜寻记

朱航满

陈子善先生的《签名本从考》经海豚出版社印出来了,我在网上买了一册,并很快读完。陈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但以“签名本”为话题来写文章,在学术界则算是“人弃我取”了。在这本《签名本从考》之中,涉及周作人、废名、陈衡哲、徐志摩、谢冰莹、顾一樵、卞之琳、陆志韦、老舍、朱维基、丰子恺、何其芳、罗念生、韩北屏、李健吾、孔另境、张爱玲、路易士、陈白尘、南星、朱自清、唐弢、艾青、陈从周、郭沫若等25人的签名本,所谈作者多是文学名家,且所谈著作又多系1949年之前出版,故而较为难得。陈先生的这些文章写得也漂亮,或谈版本,或说品相,或考证作家交际,或议论著作内容,又或者讲讲这些签名本的前世今生,令人一番遐想。陈先生嗜藏文学签名本,上下求索,积累有年,所获早已闻名圈内。以上这些,不过是陈先生收藏的名家签名本冰山一角罢了。签名本也是一种特别的研究资料,且还是第一手资料,故而我曾收藏过一阵子签名本,特别是在网上的旧书店搜购过几本心仪的名家签名本,并拟写成一册小书,但最终所获甚少,故也只能半途而废了。

我始终认为收藏签名本多少还是有一些追星的动机在其中的,与歌迷请偶像签名一样。我们热爱某个作家,便也是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份手迹的。现代以来的作家之中,我最想得到的便是周作人和钱锺书两位的签名本。周作人的文章是我最爱读的,故而看到《签名本从考》中篇首就是谈周作人的《陀螺》,且还是赠送给作家林语堂的版本,可谓极为珍贵,又颇合我的心意。由此想到了也喜读周作人文章的谷林先生,他曾得到周的多册签名本,后来他将这些签名本分赠物之止庵、沈从文等几位同好。谷林显然很珍重这些签名本,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记其得书的经过,名为《曾在我家》。扬之水在得到谷林转赠的签名本之后,又写了一篇《今在我家》作为纪念。由此可见,对于喜好作家签名本的珍重之情。北京的藏书家谢其章先生也喜爱周作人的文章,他无缘得到周作人的签名本,并言搞收藏就是人无你有,每每想到此事,便是颇感无奈。后来偶然有个机会购藏了一册周作人的藏书,上面有知堂老人的一枚藏书印章,也算是聊胜于无。周作人的签名本我无缘获得,故而我说自己在收藏签名本上乃是所获甚少,便是由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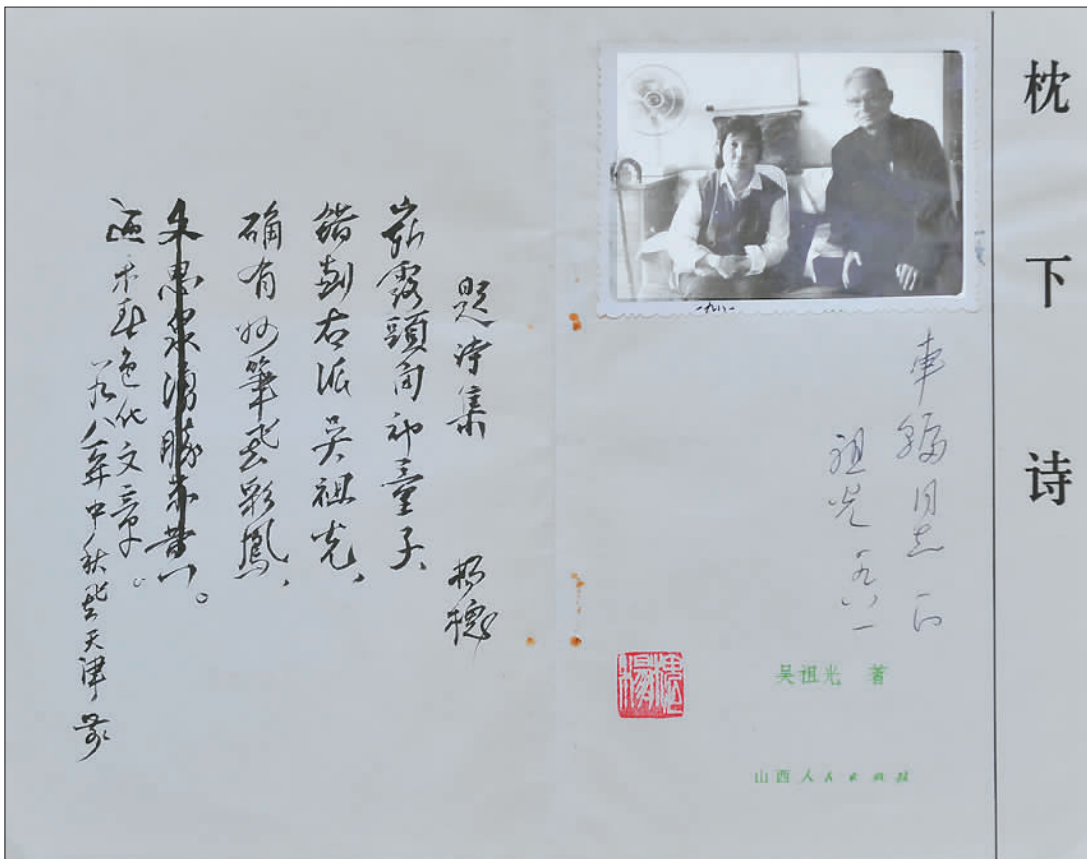
钱锺书的学问是我最为敬佩的,故而能够获得一本钱先生的签名本也是莫大的心愿。我曾在网上购得一册钱先生赠给诗人辛笛的《旧文四篇》。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仅收录钱先生的四篇论文。从各方面来看,此签名本都没有什么问题,疑点却是价格——按说钱锺书乃是时下热门人物,这种名家赠名家的东西,能够以不太离谱的价格捡漏的机会是极少的。但我却实在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地方。某日,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生过访,他与钱先生生前交往甚密,钱先生曾赠其各种著作,故而我请陆老师鉴定一下。他反复欣赏,从笔迹、印章、称谓等各方面来看,都系真迹无疑。后来老师说如果可以让他把这本书带回去,与自己所藏的签名本进行对比,才可以断出真假。对此,我当然同意。不多日,陆师再次过访,他同时还带来了一册钱先生签名的著作,与我的这册进行对比。他说我购买的这册签名本从各方面看,几乎都很难发现问题,尤其是笔迹,与钱先生的笔迹极为相似,且钱先生写字喜欢用淡墨,这个也做到了。唯一露出马脚的,便是印章。这个印章的模仿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许多细节几乎都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便是尺寸,与真正的那方印章不同,故而这位造假者很可能没有机缘见到真品。

无缘得到最心仪作家的真迹,退而求其次,我将目标选定为张中行、汪曾祺、孙犁、黄裳等几位,他们的文章,我也爱读。先说张中行的签名本。孔夫子旧书网上售卖张先生的签名本很是不少,这与中行先生生前的平易近人有关,但作为名家的张先生,自然也是造假者最易瞄准的对象。我搜购签名本,一般情况是著作为自己喜欢的内容,版本和装帧也要说得过去,且受赠对象最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这样才有趣,也可令人一番遐想。但我百般寻求,诸如这般条件的著作,却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后来,终于在网上一册张先生的签名本,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3月第6次印刷出版的一册《古代散文选》上册,受赠者是李葆华。后经查证,李葆华乃是共产党先驱李大钊的儿子,曾担任高官,位居中顾委委员。李葆华与文坛相关的事情有一件比较有名,乃是1927年4月其父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其在周作人的帮助下避难,并最终逃往日本留学。而周作人恰恰是张中行在北京大学的老师,也是对其影响颇大的一位文人。此书签赠时间为1982年5月,其时张中行已73岁高龄,但尚无专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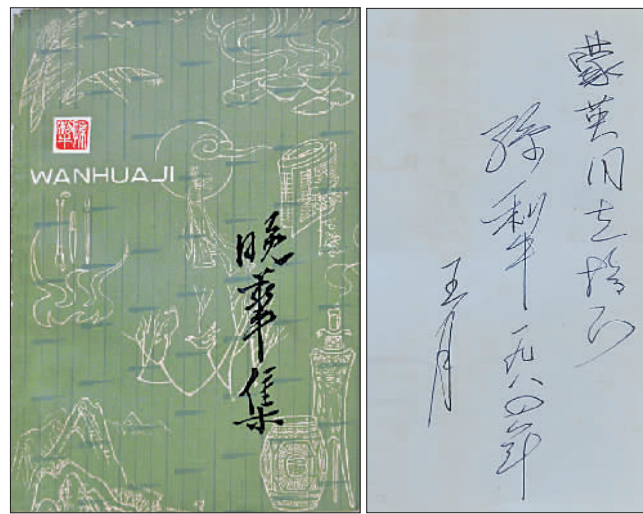
得张中行此签名本不久,鲁迅文学学院的王彬和徐秀珊夫妇过访,谈起张中行,才得知他们二位与张老生前交往甚密,尤其是徐秀珊女士,曾为张先生编过多部文集。我于是出示这册签名本,请他们鉴定。经现场断定,论笔迹,非常相像,论受赠对象,也是可能的。他们告诉我,张先生与李葆华的妹妹李星华十分熟悉,后者以研究民间文学为业,与张先生有交往。我后来还知道,李星华还是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贾芝的妻子,而贾芝又是学者贾植芳的哥哥,这些都是因此册签名本才得到的知识。但此签名本也有疑点,徐秀珊女士指出,张先生签名中的“张”字一般多写成繁体,但此处为简体,应存疑。倒是我后来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位友人晒出的张先生亲笔签赠给他的一本文集,其中的“张”字也为简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彬先生,他说要判断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李葆华的后人,了解他们交往的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判断。我看此事如此复杂,当即打了退堂鼓。我本意是搜寻一册心仪作家的签名本,却不料此中玄机多多。如此看来,搜购签名本上乃是所获甚少,便是由此可见。

再说搜购汪曾祺的签名本。我在网上的旧书店购得了一册汪曾祺的签名本《榆树村杂记》,扉页上只有一个汪先生的钢笔字签名。此书1993年9月由华侨出版社出版,收录散文35篇。我请号“天下第一汪迷”的安徽作家苏北鉴定,他认为真迹无疑,但遗憾没有上款,可能是在某次会议中随手所签。虽有诸多遗憾,但抱着有总比没有要强的态度,我还是把这册签名本买了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后来苏北来北京开会,邀我与汪曾祺的公子汪朗见面,我赠了后者一册自己的随笔集,又请他对我这个签名进行了鉴定。第二次过访,他又回赠我一册他自己的散文集《刁嘴》,并特意签了名。我见汪朗爽快,便提出能否将自己收藏的汪先生的著作盖上印章,他一口答应了。过了没几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汪朗打电话给我,他正好经过我的单位,请我下楼来拿印章。我对这个大感意外的汪朗说,请您先到办公室喝茶,他推说还有事情要办,便匆匆离开了。那天汪朗不但送来了印章,还特意为我带来了印泥。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手边所藏的汪曾祺著作全部盖上印章,包括那册有汪曾祺签名的《榆树村杂记》也都一起盖上了。在盖印章之前,我为这本签名本特意拍了照片,盖章之后又拍了照片,这事想来都是很有趣的。

收藏签名本的行为或多或少是有一些“追星”的动机在其中的——我们热爱某个作家,便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份手迹。搜寻作家签名本的过程中,既要面临去伪存真的问题,也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从签名本中,我们能感知作家的趣味、性情、交际与看重的人等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签名本也是一种特别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吴祖光签赠车辐《枕下诗》,车辐题跋,照片系车辐与吴祖光夫人新风霞。



孙犁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网上有一册孙犁的签赠本,售价甚昂,我与货主商谈,请其让价出售,结果不但没有成功,还遭到严词拒绝。网上看到一册施蛰存的《唐诗百话》,系其签赠给著名编辑左沉的,价格也倒不贵,我立即下单,谁知这个店主很快强行取消订单,告知我店员弄错了信息,立即重新定价,且将价格抬高近十倍。后来我又买到了一册孙犁文集《尺泽集》的签名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价格颇不菲,书商遮盖了受赠者。我咬牙购下,待书送来,才知道系孙犁签赠给剧作家曹禺的。起初我很喜欢,但随即便对这样的名家签赠本落落书肆颇感疑惑,但一时又难以断定。这本签赠本的签名写在扉页底端,且用钢笔写得极细,上款为“曹禺先生教正”,我把这张扉页拍成照片发给天津日报副刊部的宋安娜女士,因她生前与孙犁先生颇有往来。宋老师外,连忙请他到办公室喝茶,他推说还有事情要办,便匆匆离开了。那天汪朗不但送来了印章,还特意为我带来了印泥。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手边所藏的汪曾祺著作全部盖上印章,包括那册有汪曾祺签名的《榆树村杂记》也都一起盖上了。在盖印章之前,我为这本签名本特意拍了照片,盖章之后又拍了照片,这事想来都是很有趣的。

关于黄裳的签名本,我买到的是黄裳签赠给上海藏书家陈梦熊的一册《黄裳书话》,这本书显然也是陈梦熊的珍爱,不但用牛皮纸封面包了书皮,而且还在书多处盖有“熊融藏书”这样的私家藏书章。后来我为此签名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书之归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海作家韦洪读后,特意来信告诉我,陈梦熊先生去世后,不少藏书都是家属委托他才散掉的,价格当时定得并不太贵,如今旧书商辗转抬价,已是超出预想了。韦洪先生对于我收藏了这册签名本,甚感欣慰。诸如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例。我曾在网上一册厦门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郑朝宗先生的文集《海滨感旧集》,系郑先生签赠给一位“蔡先生”的,后又被学者谢泳收藏,并有一枚“谢泳藏书”的印章。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并推测这位“蔡先生”为谢泳曾在山西作家协会任职时的老上级蔡润田。后来谢泳告知说,这册藏书不慎失书肆,能被我收藏,他很欣慰,而那位“蔡先生”据他推测可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蔡厚。由此可知,谢泳的这本书也是在书肆所淘。我的老师陆文虎是郑朝宗先生的学生,他认为若是赠书给作为老朋友的蔡厚,称呼“蔡先生”,则略显生疏,而蔡又系福建大姓,故可能另有其人。

汪曾祺的签名本

苏北

汪曾祺真是个好老头。他去世这么多年了,影响力还那么大,生卒的纪念日总还有人记得,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家乡为他扩建文学馆。这些年来,一些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不断挖掘和研究他的史料,也收集到不少他的趣闻和故事。

他生前有诗云:“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确做到了。

作为文人,汪先生“送小温”的方式也是颇具文学性的。除了为人亲切、平和、冲淡和有趣之外,我归纳大致有这么独特的三点:一日做饭,二日赠书,三日作序。汪先生是美食家,喜欢写美文、做美食(他不是发明了著名的“塞馅回锅油条”么),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汪先生曾“自喜”:“别人说我的序写得还是不错的。”(看看!他还借别人之口。)——如若较真考究起来,汪先生的序言的确写得好。他不是特别推崇李健吾么?是的,他的序同李健吾先生的书评一样,其实都是美文。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有《汪曾祺的序言》一文,这里且不去论它了。本文要说的是汪曾祺的签名本,亦即赠书,或者推而广之,包括他赠字写画。

汪先生是没把自己的字画当回事的。“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这是他在《自得其乐》一文中说的。他写字画画,从不收钱,曾经有人给他寄过钱,他都如数退回了,还按别人的要求把画好的画寄过去。过去我的回忆文章中说,汪师母说,老汪,你刚出的某某书还没有送他们呢。汪先生会摸索出两本,签上名递给我们。记得有一回,我把书陆续购买的先生的书带过去,请他都给签上,大约有三四本吧。后来这些书也有丢失的。我那时住筒子楼,一家三口只一间便房,也就不知给哪一位拿去看了没还。先生送我的书,我手头还有几本。第一本是《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汪先生7月,那是我从县里到北京进修,一次去先生家,先生给的。第二本《旅食集》是1992年的事了。我已回到天长工作,是汪师母给寄到县里去的。书上题:“赠立新,汪曾祺,1992年11月。”1993年初我到北京工作,接触先生机会便多了。之后的几年,先生送我的书,应该有好几本,但有些丢了,有些完全不记得了。手头还有一本《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是1997年1月送我的。

我收藏的汪先生的签名本,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是《汪曾祺谈》,乃是签赠给导演“逸生淑芝”夫妇的,联想陈子善收藏的那本《升官图》,系其签赠给导演陈鲤庭,由此可见作为剧作家的陈白尘的交际和他所看重的人。

搜购签名本也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诸如我曾一次性购得了四川老报人车辐的三册藏书,系编辑家叶至善、作家吴祖光和画家马得分别签赠给车辐的著作,不料收到三本著作后,竟在书中发现各有车辐与几位赠书人的合影照片,并在照片下有大幅的题记,书中内容也多有车辐所作的读书标注和跋记,非常有趣,我因此也曾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之。再如我还收藏有一本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的签名本《我爱穆源》,系其签赠给书籍装帧家苏泰照的。书中夹有一张水彩笔,系范用的附信,内容非常简短,如下:“这本书的封面是自己装帧的,请泰照先生指教。”范用作为出版家,本人却也是热爱书籍装帧设计,三联的不少名作封面都出自他之手,其身后曾以《叶雨书衣》为名辑录出版;更令我颇感意外的是,这册签名本中还夹寄了一封复印的书信,乃是公开出版物中所没有的。此信系一位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所写,称赞范先生此书之功。信纸下方还特意印有一行小字作为注解:“他在信中所讲的,正是我所想的。这样的领导人管教育,好!”范用的文人性情由此也可见一斑。诸如此类意外的收获还有很多,这或许是搜购签名本的乐趣之一,我在此只简要记其一二罢了。

汪先生偶尔也会对自己书的装帧谈一些看法。他曾送我一本沈阳出版社编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1993年6月出版),书的封面是亚光的奶白色,仿佛还压了暗纹,摸上去手感很好。只是书的右下角画了一个葫芦,一个老头袖手侧腿缩在葫芦里,他给我题了“我并不总是坐在葫芦里”。当时我吃吃地笑了,这么好的设计(版页上注明此书设计者为李老十),他还调侃。可惜这本书给我弄丢了。几年前到大连出差,在一



汪曾祺1989年签赠本文作者《蒲桥集》

个山窝窝里的作家村里淘回一本,可惜再也补不了题签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的他的《菰蒲深处》(小说集),是红色封面,书的顶端画了一只小船,船上和水中的顶端画了几只鸭子,一个船夫在划着船,左下剪纸似的刻了一男一女抬着一箩筐,筐里坐着一个娃娃,他调侃说:“像个儿童文学。”

他曾对漓江出版社的《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出版)发表过一通很妙的议论。他刚拿到此书时,对送书上门的震震宁说:“蓝配紫,臭狗屎。”(此书封面淡紫色,而书名中“自选集”三个大字却是绿蓝色的)。震震宁回说:“臭狗屎就臭狗屎,反正书是好书。”这本书初版本才印了两千册,汪先生怕出版社亏本,给家乡高邮的官员写信,看家乡新华书店可否能订一点,以解出版社之忧。仅此小事,也可看出汪先生的善良和善解人意,许多时候,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的。我手头的这本“自选集”,就是购于高邮县新华书店,时间是1988年10月。

这二十年来——先生去世二十年了——我陆陆续续写了《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两本书,通过对先生作品的细读和一些交往的回顾,逐步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汪先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作家。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楚。他知道怎样写才是自己的,才是有独特风格的。他表面随和,其实内心极其自信,他能看得上的作家并不多。

我知道,有许多朋友手头都有汪先生的签名本。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这些名单在关于汪先生的纪念文集《你好,汪曾祺》和《永远的汪曾祺》中都能找到;黄裳、范用、邓友梅、铁凝、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初,汪先生送人书还用毛笔题签,显得很郑重。高邮金秋秋是汪先生的同乡,在1982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上,汪先生题曰:“赠实秋同志,曾祺”几个大字,字虽为行楷,但可以看出写得极安静,稳健中透着清秀。他给香港古剑的一本《晚翠文谈》,亦为毛笔所题:“古剑兄教,曾祺,85年10月寄自北京。”看笔迹,小楷俊逸,饱满有力,有明人气象。正如他自己所言“似明人笔意”。汪先生1983年画过一幅水仙,边款题:“高邮汪曾祺,时年六十三,手不战,气不喘。”

到20世纪90年代,汪先生名气已如日中天,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崇拜者,则不大见到用毛笔题签了。肖复兴曾说过,一次在北京朝阳公园搞活动,汪先生在场。肖复兴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喜欢上汪曾祺,于是便带上两本汪先生的书,请他题个字。在《蒲桥集》上,汪先生写下“朝阳初日,萧闲闲看”,这是一份特别定制。作家王干很早就认识汪先生。王干(化名),也曾任高邮工作,与汪先生也算是小同乡,一回汪先生送王干一本《释迦牟尼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则题“王干同参”四个大字。王干多少年琢磨不透“同参”何意。一次饭局聊起,大家七嘴八舌,想“同参”可能是佛教用语,大约离不了同拜之意吧。汪先生总会这样,根据题赠对象的身份特点,写上那么两句,也别有新意,使受赠人心中欢喜。

我有幸能拥有汪先生的这些签名本。我珍爱我收藏的这些签名本。我知道这些字迹现在已十分珍贵了。有时翻开这些书中的签名,看着这些字迹,如晤先生本人,我真是非常怀念他。

(作者本名陈立新,多年致力于汪曾祺研究,著有《一往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汪曾祺闲话》等)

(作者系散文家、书评人)